

煌煌汉服

——评《何以汉服》

2024年,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周年。由青年学者左丘萌所著的《何以汉服:重新发现马王堆汉墓服饰》(以下简称《何以汉服》)一书的出版,可谓应时而生。

这部著作以考古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笔触,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西汉初年服饰文化的大门。它不仅是一部汉代服饰科普著作,更是一场跨越两千年的文明对话,引领读者窥见彼时衣冠所彰显的审美与信仰。书中那些历经两千余年依旧绚丽的丝织品,不仅诉说着古代纺织技艺的高超,更映照出一个文明在特定历史节点的风貌。

汉服风貌实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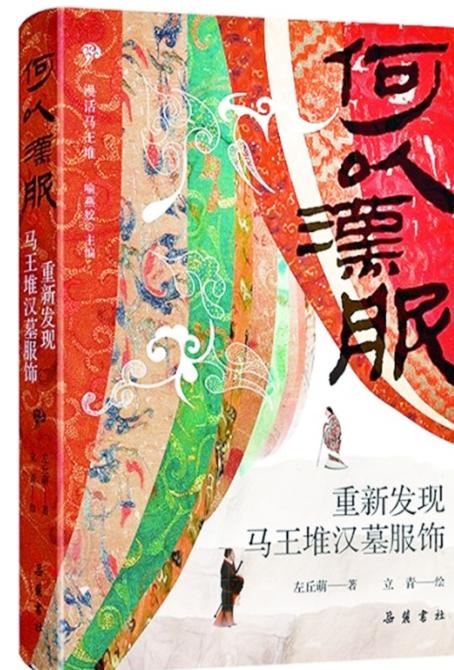
在阅读这本书之前,需要厘清一个概念——书名中的“汉服”,特指汉代服饰,而非当下泛化的中国传统服饰概念。后者在学术语境中,通常以“华服”指代。

《何以汉服》全书分为十部分,围绕九个维度——织造、染色、添花、制衣、时尚、穿着、礼制、佩饰、梳妆——全景式呈现马王堆汉墓服饰所蕴含的技术、艺术与文化内涵,堪称对马王堆汉墓服饰文化的系统梳理。与一般学术著作不同的是,作者将艰深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晓畅的语言,让读者能全面地理解马王堆汉墓的考古背景,服饰的面料工艺、染色技术、纹样演变、款式、时尚流变,汉代穿衣的礼制、佩饰与梳妆,堪称一部翔实的西汉“穿搭指南”。书中还大量运用文物图与手绘示意图,既增强了论述的说服力,又让读者能够直观感受汉代服饰之美。

例如,该书第一章对平纹丝织物“缣”的介绍,不仅引《说文·系部》(“缣,并丝缯也”)、《释名·释采帛》(“缣,兼也,其丝细致,数兼于绢。染兼五色,细致不漏水也。”)等经典阐释其形态,还配有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一个盛装土珠叽的“缣囊”图片,辅之以当下绘制的缣织物结构图,让读者对汉代织物的状貌有直观的了解。

再如,该书第三章对“印花”的介绍,不仅用平实的语言一一分析印花的颜料、用具、步骤,还广泛援引《考古》杂志、《西汉南越王墓》等书籍里的实物图片,生动介绍相关工艺。

又如,该书第五章对汉初服装风格的介绍:鉴于汉初尚俭,一种用料更为节省的新样衣式“直裾袍”,在这时出现了。该款式用料要比楚式尖角续衽的款式俭省得多,甚至衣物上繁复华丽的纹饰,也不再使用费工且不符合朝廷所倡节俭精神的刺绣来制作,而是采用相对更简易的印绘形式实现。尤为有特色的是这种服装下裳部分的裁制——大概当时一方面要维持朝廷倡导“裙不曳地”的大原则,一方面又倾心于曾经在战国时期风靡的曳地长衣带来的美感——于是直接运用立体剪裁成型手法,将下裳的宽缘制作成上窄下宽的梯形。这段介绍,不仅文字表述清晰,点明了服装风格形成的社会原因,还配发大量汉代彩绘陶俑照片及汉服形态构拟图,让汉初的这种风尚一目了然。



△ 马王堆357号竹笥中的衣物,图片选自《何以汉服:重新发现马王堆汉墓服饰》

马王堆服饰的特殊价值在于其考古证据的完整性——织物残片、成衣实物、遣策清单及简牍文字等多维度的遗存,罕见地保留了从织造到穿着的全流程信息。这些文物成为研究西汉初期服饰制度的有力证据,如作者所言,它们以实物的方式重现了汉代生活图景。

书名中的“重新发现”一词,呼应了书中的创新成果,如:出土文献释读(缀合残简、考释服饰相关文字),名物考证(文献与实物互证特定衣物)、纺织工艺(解析织造工艺与服饰结构)、艺术史研究(纹样风格与传承关系)、制度史探析(结合礼制记载分析周礼与汉代信仰)。

服饰制度新解

除了详细分析论证汉初服饰风貌之外,《何以汉服》还有以下创见。

专门对服饰礼制进行探讨,提出辛追(轪侯夫人,马王堆一号墓主人)服饰“承旧制”,而轪侯之子(马王堆三号墓主人)服饰“应新制”。

作者通过对马王堆一号墓出土衣物的精细分析,发现其严格遵循《仪礼·士丧礼》:小殓时精美罗绮衣物穿于内侧,绢衣在外。大殓时精美的绮罗被覆盖于外,绢衣在内,多余衣物另置竹笥随葬。据此,该书认为,辛追殓服实物印证了先秦丧葬礼制在汉初的延续。作者将辛追的服饰与《周礼》所记载的侯伯夫人的礼服进行对照,推测其部分服饰可能属于礼仪性装束,而非纯日常衣物。作者还指出,辛追的服饰风格是战国时期楚地贵族审美传统的延续,曲裾深衣、云气纹等大量地保留了楚风。

书中推测,三号墓出土的《车马仪仗图》中墓主人所着的皂色深衣“袞”,为汉代承袭秦制的祭服,“袞”是上下联属的深衣,功能上属于外罩一类的服饰。汉文帝时,“袞”被定为岁首朝贺的朝服,沿用至东汉。《车马仪仗图》表明,西汉初年,男性贵族服装严格遵循礼制,凸显了对中央

王朝的服从。注意到服饰风格在性别上的差异性。与男性“袞”遵循统一标准相比,辛追的服装则强烈体现了楚地的审美——纹样上,“乘云绣”“信期绣”等延续了战国楚式飘逸的风格;工艺上,保留了手工特色(如“信期绣”中错用了绞样,但因罗绮珍贵,而“将错就错”);文化上,服饰成为楚贵族群体记忆的载体。这一特征说明,西汉初期,与男性服装注重与中央规制保持一致相比,女装的选择更为多样,体现了男服“重礼”、女服因为生活习惯而“尚情”(保留更多地域习俗)的区别。

此书还对部分织物的功能和纹饰流行的原因提出了新见解。

例如,作者对素纱的双重角色进行了探讨,提出素纱制作的单衣不仅属于外穿罩衣,也是一种穿着在“六服”之内的衬衣。笔者以为,据郑玄所注的《周礼》,素纱理解为“六服”(包括夹衣、绵衣两种)的衬里还是比较妥帖的,功能是以衬托“六服”面料的纹样色彩。再如,作者对“乘云绣”纹样标准化的原因作了推测,提出“乘云绣”纹样跨越三百年、遍及南北贵族墓,可能是中央朝廷试图通过规制服饰和礼仪对各地进行控制的结果。

在书中,作者还以考古实物为“针”、文献为“线”,揭示汉代服饰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复杂性,其研究展现了服饰作为“制度载体”与“情感媒介”的双重本质,为理解汉代物质文化与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
学术新见迭出

近年来,汉代服饰研究论著迭出。2016年出版的《汉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》,运用考古类型学等方法,系统探讨汉服的形制、演变、传播及文化动因。2018年出版的《马王堆汉墓服饰研究》,全方位梳理马王堆汉墓出土服饰,考证其名称、源流、工艺与制度。2024年出版的《汉服的形成》,综合运用考古材料与文献

证据,揭示东周秦汉时期服饰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。这些著作学术性强、专业价值高。

《何以汉服》一书,在综合了解前人成果基础上,也有自己的开拓。全书以马王堆汉墓出土服饰为核心,构建了早期汉代服饰研究的完整框架,在方法论、理论建构和学术视野三方面表现突出。

方法论层面,作者运用实物与文献互证的研究范式,提出不少新的见解。例如“染色”部分,作者区分了植物染、矿物染和生物染三种主要方法,并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古人如何利用自然资源“制造”出自己喜爱的色彩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书中关于“齐紫袞服最矜贵”的讨论——由于需要从东海之滨的紫贝中提取染料,紫色丝绸极其昂贵,齐桓公喜好紫色服饰,造成了当时齐国上下都追求穿紫色衣服的奢靡风气,以至于齐桓公不得不向管仲求教如何制止这种风尚。这种对色彩背后经济成本与社会地位的揭示,让我们得以理解为何汉代会形成严格的服色制度。在“添花”部分,作者对印花、敷彩、刺绣等工艺的考证尤为精彩——提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“绮织物”是暗花织物的泛称;考证“越固锦”属于一种有角母羊的动物纹锦;原名为孔雀水波纹锦的织物,应被称作兔丝锦;“方棋纹绣”,应名为连(见图1)绣;等等。作者还通过马王堆帛画中的穿衣形象、遣策文字记录与实物的对比,梳理出当地“楚服”向“汉服”转型的关键节点。

理论建构层面,作者秉持动态的服饰史观,证明“朝代更替即服制剧变”的线性史观并不正确。以辛追夫人保留楚风的穿搭为例,作者证明了服饰风尚具有跨朝代的延续性。作者还揭示了官方制度(如标准化的“乘云绣”)与民间逾越(如商贾穿锦)始终并存的复杂关系。这种视角打破了传统服饰史研究的僵化框架,为理解服饰文化的演变提供了新思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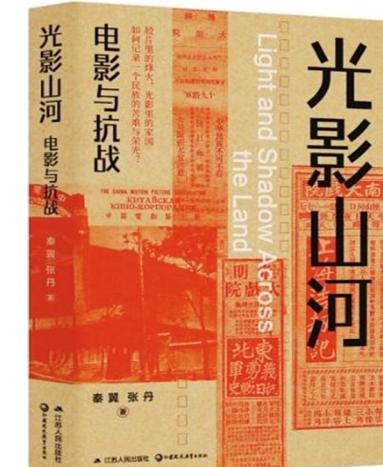
视野拓展层面,作者通过跨区域文化的比较,勾勒出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长江流域的服饰面貌。书中通过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与湖北江陵楚墓、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的比较,发现辛追衣饰中楚地“尚赤”习俗与朝廷推行的秦制“尚黑”制度并存,证明在汉代初期,地方文化仍然拥有顽强的生命力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书中指出,马王堆部分纹样与匈奴、滇文化中的纹样相似,将汉代服饰研究置于更广阔的文明交流视野中考察,为东亚服饰文化的早期交流提供了新证。

综观之,《何以汉服》以马王堆汉墓服饰为钥匙,揭示了汉代文明的密码。它不仅是严谨的学术著作,更以生动的笔触展现了服饰中的技术、艺术与文化,是对中华美学的又一次溯源。

(原载《光明日报》,作者为王树金)

新书推介

《光影山河:电影与抗战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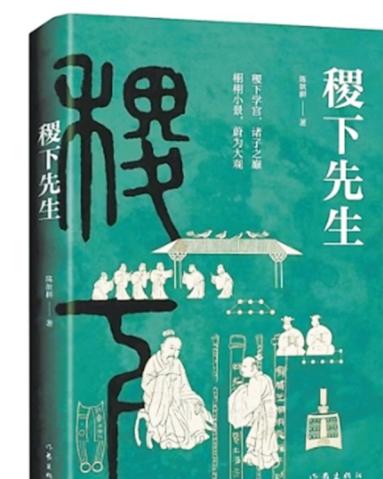
内容简介:这本书以光影铸史,通过珍贵影像资料与历史档案,呈现了抗战十四年间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脉络,映照出中华民族浴血抗争的壮阔图景。

《作风建设50例》



内容简介:本书讲述先进榜样和模范群体的作风故事,以“案例+点评”的形式展现优良思想作风、组织作风、工作作风、生活作风等。

《稷下先生》



内容简介:先秦诸子百家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座高峰。本书聚焦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,再现中国文化史上的华彩乐章。

(本报综合)

青年楷模何功伟

——鄂南敌后抗日开路先锋

带领着战友们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。”

1940年6月12日,宜昌失守后,何功伟偕同许云来到巴东。在巴东,何功伟主持召开县委会议,传达中央的“五四指示”,即“放手发展抗日力量,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”,提出要坚决向国民党顽固派防共、限共、反共的政策作斗争;坚决执行发展进步势力,争取中间势力,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;在国统区要隐蔽精干、长期埋伏、积蓄力量、以待时机,反对急性和暴露,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法律、命令和社会习惯,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。会上,何功伟传达了上级关于建立巴(东)、(秭)归、兴(山)、宜(昌)工委的决定。巴归兴宜工委辖巴东、秭归、兴山和宜昌未沦陷的地区。

1940年8月,何功伟和怀孕六个月的妻子许云离开巴东,翻山越岭四百多里到达恩施。这时,南方局负责组织工作的钱瑛也来到了恩施。

8月16日,在钱瑛主持下,在五峰山红岩狮施巴特委机关召开湘鄂西区委扩大会议,宣布南方局关于撤销湘鄂西区委及其所属施巴特委的指示,成立中共鄂西特委,由何功伟任书记,王栋任组织部部长,马识途任宣传部长,何功楷任青年部长,刘惠馨任妇女部长。鄂西特委领导恩施地区的八个县和宜昌地区的宜昌、宜昌、秭归、五峰、兴山五个县的工作。特委机关设在恩施城郊五峰山腰的一个农民家里。特委委员进行了分工,马识途主管利川、来凤、咸丰、宣恩、五峰;王栋负责巴东、兴山、建始、恩施等县;刘惠馨负责机关工作;何功伟在城区一带活动,主持全面工作。



何功伟,又名何明理,化名何彬、何斌。1915年出生于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,1941年牺牲于恩施。

(上接第13期)

许云回忆说:“我当时最感苦恼的是怎样才能正确地分析时局动向,在工作中怎样透过许多现象来抓本质的问题。这时,何功伟同志给我很多实际的帮助。我见到他经常从《世界知识》、国民党的报纸以及我们所能听到的正、反面材料中,提出问题,分析不同时期的时局动向和敌人的政策,从而提出怎样正确执行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和运用党的不同策略。他善于反复提出问题,多方面分析推敲,重视调查研究的材料,最后再作结论。他经常用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揭露敌人各样反动宣传的本质。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,何功伟就是这样,

特委会议结束后,由于许云已有了五、六个月的身孕,留在鄂西活动不方便,组织决定调她到南方局工作,许云即随钱瑛一起去了重庆。

宜昌失守后,湖北的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迁至恩施,恩施已成为湖北省战时政治军事中心,陈诚担任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长兼湖北省主席,驻扎在恩施。陈诚把驻湖北的各种特务组织的头目纠集起来,成立一个专门对付鄂西共产党组织的“恩施高干会”,统一指挥中、统、军、省保安处第四科、三青团等反动组织,后改组为第六战区党政工作总队,以反共作为首要任务。

施鹤八县遍布特务,他们查封进步书店,销毁进步书刊,解散抗日群众团体,检查邮政来往信件,大造反共舆论,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盯梢、追捕。因此,摆在鄂西共产党面前的形势十分险峻。

何功伟领导的鄂西特委,紧张地开展重点转移的活动。何功伟向各县、各单位紧急布置撤退露红干部,调派干部去建立农村据点,对混入党内的可疑分子,采取断然隔离或清洗措施,将特委所属单位分成能独立作战的几块。

何功伟多次主持召开特委会议,并在实际斗争中,既纠正了那些要在恩施搞城市暴动的“左”的倾向,又克服了一些同志中单纯依靠合法斗争,专搞学生运动的“右”的情绪,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,准备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。

他带领同志到敌特势力薄弱的偏僻山乡,或以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的身份,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,揭露日寇、汉奸、顽固派的罪行;或以教师的名义,在农村创办夜校、识字班,发动群

众和组织群众开展斗争。经过一段努力,恩施的一些农村和城关的初中、高中、农业专科学校(后改为农学院)、清江中学、生活书店(后改为胜利书店),都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或小组。这些支部或小组,在何功伟等领导下,以教师、学生、农民、工人的党员为骨干,吸收党外进步学生、教师、爱国青年参加,组织成宣传队、歌咏队、话剧队,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。生活书店还大量推销《新华日报》等进步书报。县城党的组织创办了一个地下印刷所,印制了许多宣传抗日,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投降罪恶活动的传单和党的秘密文件。通过这些活动,使恩施这个遍布国民党特务的山城,不断发出抗日救国的吼声,广大农村的革命形势,更是生机勃勃。

与此同时,何功伟按照南方局的指示,强调要加强党员的气节教育。从1940年9月到11月,陆续编印了《革命气节教育提纲》《支部工作纲要》《党员初级课本(党员须知)》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》《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》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》《论三民主义与康敏主义的关系》《工人抗战读本》《农村抗战读本》等,并复写眷印,秘密分发到各地县委。为了保管好这批材料和书籍,何功伟曾向转运的同志叮嘱:这是关系到鄂西党组织存亡的大事。

何功伟活动在国民党军警特务机关林立的恩施城郊五峰山,他经常遇见熟悉的面孔,已有不少特务在追踪他。他紧张地工作着,争取时间将隐蔽骨干和教育党员两大事安排好。他的秘密住处在五峰山国民党的警报电台,各处来找的同志,都由多路的交通员安排

在离城十几里的龙凤坝、严家湾等地见面,他总是黑夜里四处走动,联系工作。繁重的工作与艰苦的生活使他的身体大不如前,他身患疟疾,又被狗咬了,不得不去医院看病治疗。

国民党反动派对恩施出现的革命活动十分气恼,陈诚等下令在鄂西地区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。在此如此危急时刻,何功伟仍心系基层,积极组织安排鄂西特委工作。1940年9月,何功伟在恩施龙凤坝,听取归兴巴宜工委书记李世荪汇报;会见建始县委书记孙士祥,强调隐蔽精干,保护组织;派陈克东任建始(巴东)中心县委书记;到建始县三里坝召集全县各学校和农村支部负责人举办党员训练班,领导大家学习文件,向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传达党中央、南方局政策。1940年10月,何功伟在金子坝会见恩施高中党支部书记夏穆三,要求将工作重点迅速转移。

被捕入狱斗顽敌

1940年12月,鄂西特委交通员向仲亚被捕叛变。由于何功伟在武汉工作时就已露红,他的处境十分险恶。上级决定调他离开鄂西。他对钱瑛说:“大姐,都撤了,这儿工作怎么办?”何功伟知道自己有危险,为了工作他坚决地留下来。党组织同意了何功伟的要求,但他一再叮嘱,要他立即搬到乡下龙凤坝去。何功伟抓紧时间,一方面组织那些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立即转移和疏散;一方面教育那些留下来的党员坚定立场,保持革命气节。

(备注:何功伟烈士在鄂西革命活动相关内容由恩施州史志研究中心供稿)

《何功伟烈士传》连载14

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主办